

# 《唐诗归》初盛唐卷蓝本考辨<sup>\*</sup>

——兼及《诗归》的成书问题

韩震军

**内容提要** 《唐诗归》是竟陵派诗学的一面旗帜，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其初盛唐卷，世人在充分肯定其诗学价值的同时，又斥其“寡陋无稽，错缪叠出”，至于字句，“随意窜改”。而这些又都与其取资的蓝本有关。《唐诗归》的蓝本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唐诗品汇》。在编选时间短暂、“求异”“避熟”等主客观因素作用下，《唐诗归》选择了明万历间黄德水、吴琯递纂的《唐诗纪》作为其初盛唐卷的蓝本。锺、谭二人依托《唐诗纪》，于大量承袭和稍许新变间，发挥自身能动性，选择评点对象，传达诗学观念。《唐诗归》初盛唐卷蓝本的确认，进一步佐证了中晚唐卷是锺惺后来补充选定的，同时为认识明代唐诗学从重视“格律”至强调“性灵”的转变过程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唐诗归》 《唐诗纪》 蓝本 锺惺

万历四十五年（1617）问世的《诗归》一书，是中国诗学史上一部重要的诗歌选本，在明末影响颇为深远。时人钱谦益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sup>①</sup> 邹漪曰“当《诗归》初盛播，士以不谈竟陵为俗。”<sup>②</sup> 《诗归》一书问世，竟陵派旗帜树立，学者闻声趋从，诗坛风向为之一改。《静志居诗话》载“《诗归》出，而一时纸贵。闽人蔡复一等既降心以相从，吴人张泽、华淑等复闻声而遥应，无不奉一言为准则的。”<sup>③</sup> 《启祯野乘》亦记“《诗归》一选，剝新领秘，别开堂奥。”随后，“王李之帜几为尽拔”（《启祯野乘》一集卷七，第15b、17a页）。锺、谭二人自出手眼，借助选评古人诗作立论创说，其中多有冲击“七子”之论，这对明代复古诗学发展之弊病，无疑有着积极的纠偏作用。正如清人所言“锺、谭《诗归》之选，明季操觚家奉为津筏……去文存质，将以力排飞扬蹈厉之失。”<sup>④</sup>

诚然，世人在充分肯定《诗归》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对其也有不少指责。钱谦益称《诗归》“寡陋无稽，错缪叠出，稍知古学者咸能挟策以攻其短”<sup>⑤</sup>，并举其初唐朱仲晦《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诗，以攻其舛<sup>⑥</sup>。顾炎武谓“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同时以章怀太子《黄台瓜辞》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唐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2&ZD156）阶段性成果。

①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锺提学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下册，第570页。

② 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七，明崇祯间刻清康熙间重修本，第17a页。

③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2页。

④ 陈寿祺《丁炜传》，钱仪吉纂，靳斯标点《碑传集》卷八一，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册，第2324页。

⑤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锺提学惺”条，第570—571页。

⑥ 参见阎若璩撰，黄怀信、吕翊欣校点《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257页。

“四摘”与“摘绝”之异文为例，斥其“皆不考古而肆意之说”<sup>①</sup>。李重华曰：“《诗归》以误字为奇妙。如张曲江《咏梅》诗‘馨香今尚尔，飘荡复谁知。’馨香误作声香，乃云生得妙。岂不可笑？”<sup>②</sup>贺裳、黄白山针对《诗归》初盛唐卷，逐条述评，例举其谬<sup>③</sup>。清四库馆臣更是进一步指出“至于古诗字句，《诗归》多随意窜改。”<sup>④</sup>等等。

这些评论均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诗归》的蓝本问题。而诸如《诗归》的蓝本是谁，其为何取资于此，《诗归》对蓝本又有着怎样的加工改造等问题，至今未见有学者专文探讨。如果将这一系列的问题考察清楚，势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探讨《诗归》的成书过程，加深对竟陵派乃至整个明代唐诗学发展的认识。

锺惺、谭元春选评的《诗归》，计五十一卷，古逸至隋十五卷，曰《古诗归》；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曰《唐诗归》。《唐诗归》曾多次被抽出单刊，其初盛中晚四部分本属于一个整体，然而前人指瑕多集中于初盛唐卷，而且有学者推测初盛唐卷与中晚唐卷不是同时选定的<sup>⑤</sup>，所以本文将《唐诗归》初盛唐卷单独提出，针对其蓝本问题稍作讨论。

### 一 《唐诗归》取资蓝本的可能性及其与《唐诗品汇》的差别

关于《唐诗归》的蓝本问题，学界目前没有专文讨论。理论上讲，在其成书之前，世上流布的一切相关唐集，都可能成为《唐诗归》的取资对象。但基于总集编纂的时代承袭性、材料累积性，明前的唐集多已为明人所关注乃至利用。在锺、谭着手编选《唐诗归》之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明代先后刊出了大量的唐集。规模较大的总集就有数部，如高棅的《唐诗品汇》、张之象的《唐诗类苑》、李攀龙的《古今诗删》、吴琯等人的《唐诗纪》、吴勉学的《四唐汇诗》等。正如陈广宏先生所言“在明代，随着复古思潮的兴起，有关古唐诗歌选集的编纂渐渐地多了起来，尤其是嘉靖以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它们中有些实际上已直接成为《诗归》的蓝本。”<sup>⑥</sup>

在明人编纂的古唐诗集中，《唐诗品汇》是较早的一部。《唐诗品汇》一百卷（包括《唐诗拾遗》十卷），由闽人高棅于明初编成，《明史》称其“终明之世，馆阁宗之”<sup>⑦</sup>。《唐诗品汇》不论在诗学理论方面，还是在作品搜选方面，的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其初盛中晚“四唐”的界分，“正始”“正宗”“名家”“大家”等名目的别列，几乎成了明人论唐的准的。尤其是在选唐上所表现的宏博一面，后来者少有人能够超迈。正因如此，《唐诗品汇》成为其后多数唐诗选本的取资对象，如高棅《唐诗正声》、李攀龙《古今诗删》之唐代部分<sup>⑧</sup>、唐汝询《唐诗解》<sup>⑨</sup>、顾应祥

① 顾炎武撰，严文儒、戴扬本校点《顾炎武全集·日知录》卷一八“改书”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册，第736页。

② 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清刻《昭代丛书》本，第25b—26a页。

③ 参见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270—281页。

④ 纪昀等撰，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册，第2706页。

⑤ 参见邹国平《〈诗归〉成书考》，《中西学术》第1辑，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⑥ 陈广宏《竟陵派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⑦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册，第7336页。

⑧ 胡震亨指出“李选与《正声》，皆从《品汇》中采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⑨ 唐汝询《唐诗解·凡例》称“故是编悉掇《品汇》之英，不复外索。”（唐汝询选释，王振汉点校《唐诗解·凡例》，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唐诗类钞》、佚名《唐诗品汇七言律诗》、俞宪《删正唐诗品汇》、黄氏《唐诗品汇选释断》、蔡云程《唐律类钞》等等都是。嘉靖以后，世人对《唐诗品汇》的欢迎程度进一步提升，其先后又有多次刊刻。对于这样的情况，作为万历末年的唐诗选家，锺、谭二人不可能视而不见。翻开《唐诗归》，其卷前序言云“初唐五卷，盛唐十九卷，中唐八卷，晚唐四卷。”<sup>①</sup>对“四唐”的沿用以及其中“盛唐”的比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唐诗品汇》对《唐诗归》的浸润，并从中依稀看到《唐诗品汇》的影子。而且，后人在批评《唐诗归》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其与《唐诗品汇》相联系。如《四库全书总目》针对顾炎武指责《唐诗归》臆改《黄台瓜词》，案云“高棅《唐诗品汇》载此诗，已作摘绝，则非惺之所改，然惺因仍误本，是亦其失。”<sup>②</sup>陈广宏先生在论及竟陵派和七子派关系时说：“（锺、谭）主要目标还是瞄准了凡近‘名人’所著之《诗删》，希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相同的手段（甚至其以高棅唐诗选本、冯惟讷古诗选本为取资亦同），去肃清后七子代表人物在学古问题上的流毒。”（《竟陵派研究》，第242页）《唐诗归》的编选似乎逃脱不了《唐诗品汇》的牢笼。但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不要忙于下结论，还是先来看看二者选编唐诗的具体情况。

首先，《唐诗归》与《唐诗品汇》的编例不一。《唐诗品汇》是“诗以体类，人随诗分”，而《唐诗归》是“诗以人聚，人依世次”。以王昌龄诗歌为例，《唐诗品汇》选九十五首，分别列于卷一五的五古名家三十首，卷三一的七古羽翼五首，卷四五的五绝羽翼八首，卷四七的七绝正宗四十二首，卷六三的五律羽翼七首，卷七六的五排羽翼二首，卷八三的七律正宗一首。《唐诗归》选六十四首，集中系于其名下，列卷一一“盛唐六”，其诗歌内部没有再以诗体标目。《唐诗品汇》与《唐诗归》虽然都是通过“选”来呈现唐诗的发展脉络，传达诗学主张，但二者各有侧重。《唐诗品汇》重在分诗体观测，突出作品；《唐诗归》立足作家，整体审视。所以《唐诗品汇》以初唐为正始，而将陈子昂列在正宗，不拘泥于人与时异，甚至把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分属于不同的时代阶段。《唐诗归》则不是这样，诗人严格以世排序。

其次，《唐诗归》与《唐诗品汇》所选作品出入很大。《唐诗品汇》与《唐诗归》之间，编例明显存在差异。当然，判断不同著述之间是否存在蓝本关系，编例不宜作为唯一标准。因为后者对前者完全可以再度加工改造，形成自己的面目。特别是对于诗歌选本而言，若问其有无源流，更为重要的是看所选作品的异同关系。

从选入的作家来看，《唐诗归》初盛唐卷选诗一百六十七家，其中未见于《唐诗品汇》者五十四家，占所选比例近三分之一。从选录的具体作品来看，《唐诗归》与《唐诗品汇》差别更大。为了清晰地呈现这一点，我们不妨选择几家诗歌选录情况做一对比：

【表1】《唐诗归》与《唐诗品汇》<sup>③</sup>选诗重合情况对比表

作家姓名	《唐诗归》选录数	《唐诗品汇》重合数	非重合率(%)
唐太宗	6	0	100
宋之问	49	24	51
储光羲	52	25	52
孟浩然	69	32	54
李白	98	64	35

① 锺惺《诗归序》，锺惺、谭元春《唐诗归》卷首，明刻本，第5b页。以下引用《唐诗归》均以此版本为准，仅注卷次，不再详注页码。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下册，第2706页。

③ 《唐诗品汇》采用明嘉靖十六年（1537）序刊本。

[表1]所列作家,我们是按照《唐诗归》选入诗歌规模在一卷以下、一卷、一卷以上的范围随机抽选的,应当有一定的代表性。由表中对比统计情况不难发现,对于《唐诗归》与《唐诗品汇》都选入的诗人,两家所选作品的重合数量几乎都不超过《唐诗归》选录总数的一半,即:对于绝大多数作家来说,《唐诗归》与《唐诗品汇》所选作品非重合率都超过50%。单凭这样的比例,岂能说《唐诗归》是据《唐诗品汇》编选而成的呢?

最后,在《唐诗归》与《唐诗品汇》重合选入的作品中,有的作家归属不同。比如,《唐诗归》所选储光羲《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李白《长干行》(“忆妾深闺里”),《唐诗品汇》分别作高适《奉和储光羲》、李益《长干行》。有的诗歌题目有别。比如,《唐诗归》选录的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留别王侍御维》《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广陵别薛八》《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春中喜王九相寻》《醉后赠马四》,《唐诗品汇》分别题作《临洞庭》《留别王维》《江上寄崔少府》《送友东归》《题惠上人房》《晚春》《醉后赠高四》。还有的组诗别选,如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属于组诗,计十首,《唐诗归》选入五首,《唐诗品汇》选入四首,其中互异者有三首之多。《唐诗归》选入的“草木花叶生”“空山暮雨来”二首不见于《唐诗品汇》,《唐诗品汇》所选的“北山种松柏”一首也不见于《唐诗归》。这样的组诗异选,表明《唐诗归》选录参考了《唐诗品汇》之外的文献。至于诗歌异文,更是不胜枚举。如果一书源于另一书,那么二者相关内容总体上应趋于一致。凡此种种,则进一步佐证了《唐诗品汇》不是《唐诗归》直接取资的蓝本。那么《唐诗归》的蓝本又是谁呢?

## 二 《唐诗归》初盛唐卷与《唐诗纪》的高度契合关系

近年,我们在整理《唐诗纪》时发现,《唐诗归》初盛唐卷与《唐诗纪》有着密切的关联。《唐诗纪》是明代万历前期,先经黄德水编选,后在吴琯的主持下编刻而成的一部唐诗总集。《唐诗纪》志在“举全”一代之诗,全书共一百七十卷,包括初唐六十卷、盛唐一百一十卷,汇集初盛唐诗人五百七十多家,诗歌八千三百六十余首,并且考世里,叙本事,采评论,订疑误,诗以人系,人以世次<sup>①</sup>。《唐诗纪》辑录“多本人原集或金石遗文”,“校订先主宋板诸书,以逮诸善本”<sup>②</sup>。由于《唐诗纪》成书较早,再加上后来清编《全唐诗》的通行,因此,清代以来很难看到较大规模的利用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社会的逐步开放,学术的进一步繁荣,《唐诗纪》才重新被世人所关注。

关于《唐诗纪》的价值,周勋初先生曾有过评述。他在《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中指出:“《唐诗纪》是水平很高的一个集子。编者态度认真,在搜集材料和鉴别材料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它是)钱(谦益)编唐诗总集的底本。《唐诗纪》对传播唐诗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由于史实的几被湮没,读御定《全唐诗》者几不知其出于季振宜《全唐诗》,而不见季书者也就不知其出于钱氏的残稿,倘若不把诸书仔细比较,也就不知道它们原来都以吴琯的《唐诗纪》为主要依据。”<sup>③</sup>周先生文章论点鲜明,但受研究主题的限制,其中关于《唐诗纪》的论断只处于一个从属的位置,而且对于《唐诗纪》与明代末期一些唐诗选本的关系,并未过多涉及。

我们将《唐诗归》初盛唐卷与《唐诗纪》进行比对,发现二者相关内容高度一致。

首先,《唐诗归》与《唐诗纪》编例相近。《唐诗纪》沿用了《唐诗品汇》的“四唐”分期,

① 参见拙文《〈唐诗纪〉作者吴琯生平考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

② 黄德水、吴琯《唐诗纪·刻唐诗纪凡例》,明万历十三年(1585)序刻本,第1b—2b页。

③ 周勋初《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94页。

其与《唐诗归》都是“人以类分，诗以人系，人以世次”。在《唐诗归》成书之前，明人编选唐诗总集多以“题”“体”类聚，像《唐诗类苑》《四唐汇诗》，它们虽然也采用了“四唐”分期，但其类例并非“人以类分，诗以人系，人以世次”。《唐诗类苑》对所辑诗歌按照主题分类，大部下面再分子目，各诗以类相从。《唐诗类苑·凡例》云：“是集始是天文、地理，次及帝王、职官，以至礼乐、文武、人物、器用、居处、技艺、草木、虫鱼，各以类次。”“是编也，各部之中，并列其目，如日月星河，则列之天部；郊原村野，则列之地部。其诗之在各部者，又并有其次，如天部日诗，咏日后继以早日、初日，初日后继以日出、日入、日高、日午，日午后继以日华川上动、白日丽江皋、日暖万年枝。于是，又次以夏日、秋日、冬日，而日长、日落，至夕阳，始竟矣。”全书将诗歌共分三十九个大部，一千零九十四个小目，其编排原则极似类书。《唐诗类苑·凡例》又云：“诗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等制，兹集似混而不分，盖编题既以类次，其体不得复序。”<sup>①</sup>《唐诗类苑》对于诸部类下的诗歌，没有再进一步分体排列，这与《唐诗归》“诗以人系，人以世次”的编录方式不同。《唐诗类苑》所收诗人诗作排列较为分散。仅就这一点而言，《四唐汇诗》与其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四唐汇诗·凡例》曰：“其间人则世次，体则类分。类分之中，又即其题，使各为类聚。”<sup>②</sup>其综合了《唐诗纪》和《唐诗类苑》分别以“体”“题”类聚的特征，编例上采用先分体后别题的二维度分类方法，使得同一诗人的诗作更加分散地列于卷内。《四唐汇诗》对所辑诗歌先按三古、四古、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相区分；每一体类下，再以乐府、典礼、志感、赠答、送别、行迈、古迹、燕游、题咏、悲悼等相题别。同样，《四唐汇诗》与《唐诗归》的编排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别。较之《唐诗类苑》《四唐汇诗》，《唐诗纪》与《唐诗归》有着更加相似的编排体例。

其次，《唐诗归》初盛唐卷所选诗人诗作几乎不出《唐诗纪》的范围，而且诸家在卷中的先后次序一致。除《唐诗品汇》外，《唐诗类苑》《唐诗纪》《四唐汇诗》都是明代嘉靖、万历间以求“全”一代之诗而成的大书。三者取材上有一定的承继关系<sup>③</sup>，就初盛唐部分而言，它们收录诗歌的数量差别不是很大。故单从择录诗歌范围着眼，很难判断它们与《唐诗归》的亲疏关系。但正如上文所述，《唐诗类苑》《唐诗纪》《四唐汇诗》编排体例各不相同。所以联系卷内诗歌及其次序，可以考察它们与《唐诗归》的关联程度。我们从头至尾逐一比勘《唐诗归》初盛唐卷内诗人诗作，其先后次序与《唐诗纪》的一致率近于99%；相反，与《唐诗类苑》《四唐汇诗》几无一致性可言。为便于直观，又囿于行文篇幅，我们随机截取二集目录片段列成表格，参见[表2]。

《初唐汇诗》与《初唐诗纪》辑录诗作数量大体相当。[表2]所列《唐诗归》采录的初唐诸作，在《初唐汇诗》中的次序为：卷二，张烜《婕妤怨》、王训《独不见》；卷二七，符子珪《芳树》、梁献《王昭君》、沈祖仙《秋闺》；卷六三，庾光先《奉和刘采访缙云岭南作》；卷六九，徐安期《催妆》。较之《唐诗归》，《初唐汇诗》次序错杂，二者无可关联。相对于《唐诗纪》而言，《唐诗类苑》初盛唐部分辑诗数量稍逊。《唐诗归》所收符子珪《芳树》、王训《独不见》、张烜《婕妤怨》、庾光先《奉和刘采访缙云岭南作》、丘为《留别王维》《送阎校书之越》，均不见于《唐诗类苑》。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怎能说《唐诗归》初盛唐卷取资于《唐诗类苑》《四唐汇诗》诸集，而其蓝本与《唐诗纪》无关呢？

① 张之象编《唐诗类苑》“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② 吴勉学《四唐汇诗》“凡例”，《初唐汇诗》卷首，明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第1a页。

③ 《唐诗纪》初唐卷五萧翼《答僧辨才》题下注“见《（唐诗）类苑》。”（《唐诗纪》卷五，第17a页）彭好古《四唐汇诗序》云“唐诗刻，吴氏旧有《纪》矣，《汇》视《纪》更详，亦更晰。”（《初唐汇诗》卷首，第1b页）显然，成书时间介于《唐诗类苑》与《四唐汇诗》之间的《唐诗纪》，在辑录唐人诗歌方面，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表 2] 《唐诗纪》与《唐诗归》目录对比表

初唐部分				盛唐部分					
《唐诗纪》		《唐诗归》		《唐诗纪》		《唐诗归》			
作者次序	篇目次序	作者次序	篇目次序	作者次序	篇目次序	作者次序	篇目次序		
徐安期	催妆	徐安期	催妆	慕容承	携素饌过王维	慕容承	携素饌过王维		
颜舒	凤栖怨	未选		丘为	寻西山隐者不遇	丘为	寻西山隐者不遇		
沈祖仙	秋闺				沈祖仙		秋闺	题农夫庐舍	题农夫庐舍
邵士彦	秋闺				泛若耶溪		泛若耶溪		
吴大江	捣衣				湖中寄王侍御		未选		
虞羽客	结客少年场行				寻庐山崔征君				
符子珪	芳树	符子珪	芳树		留别王维		留别王维		
王训	独不见	王训	独不见		竹下残雪		未选		
张烜	婕妤怨	张烜	婕妤怨		登润州城		登润州城		
张修之	长门怨	未选			送阎校书之越		送阎校书之越		
张琮	蜀道难				省试夏日可畏				
郭恭	秋池一枝莲			左掖梨花	左掖梨花				
梁献	王昭君	梁献	王昭君	孟浩然	从张丞相游南纪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	孟浩然	未选		
乔备	出塞	未选			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		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		
	长门怨				晚春卧病寄张八		未选		
庾光先	奉和刘采访缙云岭南作	庾光先	奉和刘采访缙云岭南作		秋登兰山寄张五		秋登兰山寄张五		

《唐诗归》初盛唐卷与《唐诗纪》不仅诗人诗作次序高度契合，而且误收情况亦无二致。除上文曾提及的朱熹《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诗外，再如，王训《独不见》为南北朝梁诗，《长林令卫象饬丝结歌》非李峤诗<sup>①</sup>（《唐诗类苑》作中唐司空曙，《唐诗纪》辑入以上二诗，均未能辨正，《唐诗归》同样误将它们采录卷中。同时，《唐诗纪》与《唐诗归》相关诗句文字也基本没有差异。以杜甫诗卷为例，《唐诗纪》广采“宋本”“旧本”“世本”“吴若本”“近本”“今本”等作逐字校勘，择善而从，异于任何他本，形成了自己的版本样态<sup>②</sup>。如所录《柴门》诗，“我今远游子，飘转混泥沙”二句校云“宋本无以上二句。”《夜》诗，“新月犹悬双杵鸣”句校云“双，旧本作数。”《草堂》诗，“焉知肘腋祸，自及泉獍徒”二句校云“獍，世本作镜。”《玩月呈汉中王》诗，“关山同一点，乌鹊自多惊”二句校云“点，世本作照。”《小寒食舟中作》诗，“娟娟戏蝶过开幔”一句校云：“开，世本作闲。”《宴王使君宅题二首》（其二），“泛爱容霜鬓，留欢上夜关”二句校云“关，今本作上夜阑，非。”《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送客逢花可自由”一句校云“花，今本作春。”《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吴牛力容易，并驱纷游

① 参见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3 页。

② 参见拙文《论〈唐诗纪〉整理唐集的成绩》，安徽师范大学诗学研究中心编《中国诗学研究》第 13 辑，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

场”二句校云“纷游乐场，一作动莫当。”《客居》，“览物想故国，十年别荒村”二句校云“荒，一作乡。”而《唐诗归》选入的这些诗歌文字，与《唐诗纪》所录完全相同。甚至有些作品的缺字，《唐诗归》与《唐诗纪》也是一致的。比如宋之问《初发荆府赠长史》，《唐诗类苑》《四唐汇诗》失收此作，《唐诗纪》辑录并标注“首联缺”，《唐诗归》卷三选入时，句首注“缺二句”。若只是一二处的一致，说是系有同本，或属于巧合，但如此大规模的相像，就不能不说二者之间存在源流关系。

对于以上这些，仅就某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可能还无法断言《唐诗纪》即《唐诗归》初盛唐卷蓝本，但当卷内诗人诗作次序、诗歌文字、误疏之处等同时一致时，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唐诗归》曾直接取资于《唐诗纪》。对于这种推断，锺、谭二人的评语也进一步提供了一些佐证。

《唐诗归》卷六“刘昫虚”名下，锺惺总评曰“妙在止十四首，一字去不得。其用意狠处，全在不肯多。予尝爱此十四首，命林茂之书成小册，而题其后有云‘陶公坐高秋，俗士不敢入。不受人去取，孤意先自立。’良是此君实录。”从锺氏评语知，其编选刘诗所据蓝本只有十四首，且其一字不删地收入了《唐诗归》。那么，《唐诗归》选评刘诗究竟依据何本呢？检索万历之前诸代书目，没有著录刘昫虚集。查阅各类典籍，在《唐诗归》成书之前，收录刘昫虚诗歌数量较多的，有殷璠《河岳英灵集》十一首，《文苑英华》十首，《唐诗纪事》七首，《唐诗品汇》十三首，《唐诗类苑》十二首，《唐诗纪》十四首，《盛唐汇诗》十四首。为便于了解各家具体收录情况，我们特制作如下表格：

[表3] 诸家收录刘昫虚诗歌作品情况一览表<sup>①</sup>

序号	《唐诗纪》	《河岳英灵集》	《文苑英华》	《唐诗纪事》	《唐诗品汇》	《唐诗类苑》	《盛唐汇诗》	《唐诗归》
1	江南曲	○ <sup>②</sup>		○	○	○	○	江南曲
2	九日送人			○	○	○	○	九日送人
3	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	○	○	○	○	○	○	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
4	浔阳陶氏别业	○			○	○	○	浔阳陶氏别业
5	登庐山峰顶寺	○	○	○	○	○	○	登庐山峰顶寺
6	寻东溪还湖中作	○	○		○	○	○	寻东溪还湖中作
7	送韩平兼寄郭微	○	○		○	○	○	送韩平兼寄郭微
8	寄阎防	○	○	○ <sup>③</sup>	○	○	○	寄阎防
9	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	○	○ <sup>④</sup>	○ <sup>⑤</sup>	○	○	○	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
10	越中问海客	○	○		○ <sup>⑥</sup>		○	越中问海客
11	送东林廉上人还庐山	○			○	○	○	送东林廉上人还庐山
12	阙题						○	阙题
13	寄江滔求孟六遗文	○	○		○	○	○	寄江滔求孟六遗文

<sup>①</sup> 考虑到选录诗歌数量多寡对于比较的意义，本表所列均为收录刘昫虚诗不少于七首（半数以上）者，至于仅取其诗歌一二首之诸家，如《唐文粹》选二首，《乐府诗集》选一首，《唐音》选二首，等等，均未涉及。关于所选的比较对象，《河岳英灵集》为《四部丛刊》景明翻宋本，《文苑英华》为中华书局影印本，《唐诗纪事》为《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唐诗类苑》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盛唐汇诗》为明万历三十年刻本。

<sup>②</sup> “○”代表该集选有该诗作。

<sup>③</sup> 题作《赠阎防》。

<sup>④</sup> 题作《海上送薛文学》。

<sup>⑤</sup> 题作《海上》。

<sup>⑥</sup> 《越中问海客》收录在《唐诗拾遗》卷一。

续表

序号	《唐诗纪》	《河岳英灵集》	《文苑英华》	《唐诗纪事》	《唐诗品汇》	《唐诗类苑》	《盛唐汇诗》	《唐诗归》
14	积雪为小山				○	○	○	积雪为小山
			蒹葭花歌					
			赠乔林 <sup>①</sup>	○				

由[表3]可知,诸家唐集收录刘昫诗歌的数量有多有少,且时有诗题差异。其中,《唐诗归》与《盛唐汇诗》所收刘氏诗歌,虽然从数量和诗题两方面看,并无分歧,但诗歌先后编排次序迥异<sup>②</sup>。唯有《唐诗归》和《唐诗纪》完全相同,无论是诗歌数量、诗题名称,还是诗作排列顺序都毫无差别。如此一致,会不会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唐诗归》与《唐诗纪》“刘昫诗卷”均源自学者从未提及的同一部典籍呢?锤愷另外的一段记载,否定了我们的猜测。锤愷《题茂之所书刘昫诗册序》云“甲寅早春,舟中阅唐人全诗,畏杜审言之少,而昫止十四首,其严冷之意尤肃,如不可犯。”<sup>③</sup>“甲寅早春”,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春天。这正是锤愷从南京返乡,准备与谭元春选定《诗归》的时间。也就是说,锤愷舟中所阅“唐人全诗”,与《唐诗归》编选有关。这一点,从有关杜审言、刘昫的评语与《唐诗归》前后的一致性,便可看出<sup>④</sup>。这里所谓“唐人全诗”,显然意指唐人诗歌全集。但所称“全集”者,可以是个人别集,也可以是多人作品总集。这里到底何指呢?结合下文,既有“杜审言”,又有“刘昫”。可见,锤氏舟中所阅“唐人全诗”显然不止一人作品,理当是唐人诗歌总集。再看杜审言诗歌,《唐诗纪》收录三十九首,《唐诗归》卷二收入十六首,选中率超过40%,而且作品先后次序全同。总之,收有十四首作品,与杜审言诗歌同属一集,且有既定先后次序的“刘昫诗卷”,只有可能源自《唐诗纪》。

综上所述,《唐诗归》与《唐诗纪》存在高度的契合关系,其初盛唐卷实乃以《唐诗纪》为蓝本而选定的。

### 三 《唐诗归》初盛唐卷取《唐诗纪》为蓝本原因探析

在《唐诗归》成书之前,随着复古宗唐思潮的发展,尤其是明代嘉、万间,大量的唐人别集、总集、丛编刊刻问世,为选唐者提供了多方取资的可能性。在这多种可能性并存的情况下,《唐诗归》初盛唐卷为何专取《唐诗纪》作为蓝本呢?当然,这是《唐诗归》主客观方面的编选要求决定的。

第一,仓促成书,不可能取资于众多别集。关于《诗归》选定的具体过程,当今学者有着精审的考辨。邬国平先生经过考证,把锤、谭评选《诗归》的时间具体地确定为:最早从万历四十二年四月份开始着手编选,至同年十二月已三易其稿,基本成书(不包括中晚唐诗)。中间减去八月下旬至十月初一个多月游西陵的时间,前后历时七八个月。四十三年(1615)二月初,锤愷返京。之前,二人

<sup>①</sup> 注云“一作张谓”《唐文粹》卷一八亦作刘昫诗。

<sup>②</sup> 刘昫十四首诗歌,在《盛唐汇诗》中散布于九个卷次中,具体为:卷二,《江南曲》;卷一八,《寄阎防》《暮秋扬子江寄孟浩然》;卷二〇,《越中问海客》;卷二三,《九日送人》《送韩平萧寄郭微》《海与诗送薛文学归海东》《送东林廉上人还庐山》;卷三四,《登庐山峰顶寺》《寻东溪还湖中作》;卷四〇《浔阳陶氏别业》,卷七一《寄江滔求孟六遗文》;卷八六《阙题》;卷九三《积雪为小山》。

<sup>③</sup> 锤愷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sup>④</sup> 锤愷评之曰“初唐诗至必简,整矣畅矣。吾尤畏其少。”(《唐诗归》卷二)



又花过一些时间作了修订。四十四年（1616）十月至四十五年八月之间，锺惺又单独补入了中晚唐诗歌，至此，《诗归》才成为足本（参见《〈诗归〉成书考》）。陈国球先生据锺、谭二人的相关记载，在详细梳理其在万历四十二年前后的行踪后认为：万历四十二年五月，锺惺从南京回到家乡，拜访谭元春，二人见面后，即开始具体构想合选《诗归》。在往后的几个月里，二人先各选诗篇，再于锺惺家里汇合商讨评断。四十三年二月初，锺惺动身回北京。在此之前，整个《诗归》（包括《古诗归》和《唐诗归》）已初步完成。之后，二人又作了一些修订。《诗归》最终于万历四十五年刊行<sup>①</sup>。邬、陈两位先生在《诗归》成书的具体细节上，判断稍有不同，但对《诗归》初步完成所花时间，认识趋于一致——锺、谭二人选诗商订的工作过程非常紧张，前后历时仅短短几个月。关于《诗归》完成得如此迅速的原因，邬国平进一步指出：这一方面与锺、谭刻苦、勤奋的著书精神和紧张的工作节奏有关；另一方面，在正式开始评选《诗归》以前，他们两人（特别是锺惺）对有些诗人和作品的批评意见已经有较多的考虑。的确，以上两个因素在《诗归》成书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其在数月内就能初步完成此书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诗归》计有五十一卷，包括《古诗归》和《唐诗归》，所涉作家五百多人，作品前后跨越数千年。而实际直接参与选评的只有锺、谭两个人。且不说对选出的诗歌做出评点，单一个“选”字，若要检阅众多别集、选本，需要花费多少时日？况且对于那些中小诗人，甚至是无名氏，他们从未有别集传世，其作品零散地保存在其他文献中。为选入其一两首诗作，背后的翻检之劳将会倍增。面对这样的客观情况，锺、谭不可能以作家别集为蓝本，只能在“求全”的诗歌总集的基础上进行增删评点。而这样的做法，也可以当时人编选诗集的情况作为佐证。如嘉靖间冯惟讷编纂的《古诗纪》，“厥后臧懋循《古诗所》、张之象《古诗类苑》、梅鼎祚《八代诗乘》相继而出，总以是书为蓝本”<sup>②</sup>。基于此，我们说，在短时间内选定的《唐诗归》，选择唐诗总集为蓝本，是其编选的客观要求之一。

第二，为“避熟”“求异”，择用唐诗全集最为适宜。关于《唐诗归》的选诗标准及搜罗范围，锺惺说“于寻常口耳之前，人人传诵，代代尸祝者，十或黜其六七。”（卷二二）谭元春亦曰“代获无名之人，人收无名之篇。”<sup>③</sup>显然，锺、谭二人为了“有别”于他人选本，选诗力主“避熟”。翻阅《唐诗归》，感觉的确如此。其初盛唐卷内有一大批像元载妻王韞秀、杨贵妃、则天皇后、长孙皇后、景云、司马承祯、朱琳、冷朝光、陶岷、郑绍、梁德裕、常非月、楼颖、杨颜、金昌绪、任华、常理、蔡瑰、苏晋、王琚等之前选家很少注意的诗人，还有不在少数的如独孤及《送马郑州》、孟云卿《汴河阻风》、萧颖士《江有枫一篇十章》、李峤《长林令卫象饬丝结歌》《送李邕》等前人选本多不收录的诗篇。在明代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影响及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具体到唐诗选本，据不完全统计，《唐诗归》成书之前，明代新编或重刻的就有近百部之多。而这些唐诗选本，主要是在前代选本的基础上，增删抄录而成。如顾应祥（1483—1565）《唐诗类钞》自序云“未免考诸别集，苦于检阅，乃取《唐诗品汇》、《三体》、《鼓吹》及真西山《文章正宗》所载，摘其中间为世所称者，增入数首，仍以五、七言古风、近体各为一类，俱以世代为先后，名曰《唐诗类钞》。”<sup>④</sup>蔡云程（1494—1567）《唐律类钞序》说“予不能诗，藏拙留署，簿书多暇，因取杨伯谦、高廷礼诸选唐人诗，举其五、七言律尤粹者，分类钞之。”（《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第124页）一方面，少数唐人诗作经一收再收，逐步成为世人耳熟能详的经典；另一方面，后来选本始终无法冲破前代选本的牢笼，只能在别人既定的范围内打圈圈。针对如此情况，锺、谭要想别出心裁，首先要减少

① 参见陈国球《引古人精神，接后人耳目——〈唐诗归〉初探》，《岭南学报》1999年第1期。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下册，第2644页。

③ 谭元春《诗归序》，《唐诗归》卷首。

④ 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对已有选本的依赖,进一步扩大取材范围,争取更大的自主空间。也只有这样,《唐诗归》才有可能“避熟”“求异”,达到自己的目标。同时,对于选家来说,“见全”才能“选恰”。不遍览唐人全诗,何以知道哪首最符合“标准”?因此,为了“避熟”“求异”,尽量不取选集,而择以举“全”一代之业的唐诗全集为蓝本,是《唐诗归》编选的另一要求。

第三,因编例相近,《唐诗纪》易成为《唐诗归》的取资对象。《唐诗归》成书之前,唐诗总集数量众多,但就其编例而言,类分要素不外乎题材、体裁与诗人等。在具体编纂实践中,作品或按单一标准类聚,如《河岳英灵集》《国秀集》以人系诗,《分门纂类唐歌诗》《唐诗类苑》诗以题聚,《万首唐人绝句》《唐诗品汇》诗以体分;或二者并用相从,如《唐诗纪》先以人聚,后按体分,《四唐汇诗》先以体别,再按题分类。但完全做到“诗以人系,人以世次”的“全集”,唯有《唐诗纪》<sup>①</sup>。《诗归》强调的是诗歌创作“发展史”。锤惺曰“汉魏诗至齐梁而衰,衰在艳。艳至极妙,而汉魏之诗始亡。唐诗至中晚而衰,衰在淡。淡至极妙,而初唐之诗始亡。不衰不亡,不妙不衰也。”(卷二五)考察唐诗创作史,《唐诗归》重视的是个体作家“精神”。如卷一评唐太宗“诗终带陈隋滞响,读之不能畅,人取其艳而秀者,句有余而篇不足。”卷二评陈子昂“唐至陈子昂,始觉诗中有一世界。无论一洗偏安之陋,并开创草昧之意,亦无之矣。以至沈宋、燕公、曲江诸家,所至不同,皆有一片光大清明气象,真正风雅。”卷一一评王昌龄“人知王孟出于陶,不知细读储光羲及王昌龄诗,厚处益见陶诗渊源脉络。”卷一七评王季友“此公有古骨古心,复有妙舌妙笔。”卷二三评元结“元次山诗,溪刻直奥,有异趣,有奇响,在盛唐中自为一调。”著述体例取决于编纂宗旨,要落实上述诗学观念,《唐诗归》势必会采用“诗以人系,人以世次”的编纂体例。《唐诗归》编例问题,锤、谭宜在着手选录前就有所思考。尽管当时供锤、谭二人编选取资的可能性有多种,但从编例考虑,若用差别较大的《唐诗类苑》《四唐汇诗》诸集,重新编次的繁琐工作就会不可避免;若取体例相近的《唐诗纪》,《唐诗归》初盛唐卷的编纂就会大大方便了。两相比较,在不影响诗歌选录的前提下,有谁愿意为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兼顾以上三个方面的主客观编选要求,《唐诗归》初盛唐卷以《唐诗纪》为蓝本,即是一种必然。此外,人事机缘,勾连起锤、谭与《唐诗纪》的关系。万历十三年,《唐诗纪》在吴琯的主持下编刻于南京。之后,尽管刻板数易其主,从吴琯转至吴中珩,再归方一元等人,刊印不断,但始终未离开金陵<sup>②</sup>。《唐诗纪》初刻时,李维桢曾作序推许。锤惺与李维桢两家是同乡世交,在很早的时候,锤氏就可能听闻过《唐诗纪》。在着手编选《唐诗归》之前的数年间,锤、谭多活动于南京。而《唐诗类苑》编于华亭,刻于吴中,《四唐汇诗》编刻于杭州。南京的同城区位,更便于锤、谭获取《唐诗纪》。同期,锤、谭结识了一批文坛名人,他们中有不少人曾高度关注或利用过《唐诗纪》。比如,在南都与锤、谭有着密切往来的茅元仪,在《唐诗纪》的基础上增辑《全唐诗》。其《全唐诗凡例》云“即唐之前叶,具载《诗纪》者,代逾人,人逾诗矣。”<sup>③</sup>再如,锤惺同年进士钱谦益,曾直接剪贴《唐诗纪》编纂“全唐诗”。由此可见,《唐诗纪》在明代后期流播之广泛。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锤、谭与《唐诗纪》的关联,增大其利用《唐诗纪》的可能性。

① 相关的几种唐人选唐诗属于选集,《唐诗纪事》虽以人分卷,但同一诗人之诗,有时会散布于关联人卷中。如杜甫列于《唐诗纪事》卷一八,但其诗又见于卷二、卷二二等。

② 参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62页。传世的《唐诗纪》有文枢堂、聚锦堂等刊印本,文枢堂、聚锦堂等都是明代南京著名的刊刻书堂。

③ 郑元庆《湖录经籍考》卷六,民国九年(1920)刘承幹嘉业堂刻《吴兴丛书》本,第14b页。

#### 四 《唐诗归》对《唐诗纪》的承袭和新变

在唐集编纂过程中，诗歌作品代代承袭。对于一首诗歌文字，很难说编选者具体采摭于哪一家。但就整体而言，前代编集中，总有后世选者主要取资的对象。《唐诗归》初盛唐卷是以《唐诗纪》为蓝本编选的，这一点前文已做过较多考辨，因此，接下来的论述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唐诗归》初盛唐卷以《唐诗纪》为蓝本，除了沿用其“诗以人系，人以世次”的主体编例外，更多的是承袭其内容，接受其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单单是表层文字的取舍，而且能深入其里，成为其诗学观念得以树立的前提。具体表现在如下数端：

首先，《唐诗纪》所录诗歌文字是锺、谭评点的基础。如《唐诗归》卷一乔知之《苦寒行》“阴陵久徘徊，幽都无多阳”，锺惺评云“从古边塞之苦，在‘无多阳’三字，最堪不得。若云‘无夕阳’，苦反不极矣。”《文苑英华》卷二一〇收此诗，作“无夕阳”，《唐诗品汇》卷一选此诗，作“无多阳”，而《唐诗纪》卷一九录此诗，作“无多阳”，且小字夹注云“一作无夕阳”。由此不难看出，锺氏评点立论，是据《唐诗纪》所录诗句文字而发。《唐诗归》卷二二杜甫《江畔独步寻花》“稠花乱蕊裹江滨”，锺氏云“裹字下得奇。”此句，宋刊本《杜工部集》卷一二、《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二四均作“稠花乱蕊畏江滨”，明嘉靖本《万首唐人绝句》卷一作“稠花乱蕊裹江滨”。《唐诗纪》录此诗作“稠花乱蕊裹江滨”，并于行间校勘云“裹，一作畏。”《唐诗归》卷二三选《解闷》，其中有“溪友得钱留白鱼”一句。此句，宋刊本《杜工部集》卷一九作“溪友得钱留白鱼”，明嘉靖本《万首唐人绝句》卷一作“溪女得钱留白鱼”，而《唐诗纪》杜甫诗卷辑录此诗句为“溪友（一作女）得钱留白鱼。”锺氏评点此句云“‘溪友’二字，即野老争席之意。或作溪女，则肤且近矣。”锺惺显系在《唐诗纪》辑校文字的基础上作点评。再如，谭元春于卷二四评点沈千运《山中作》“庶事皆吾身”一句，“用庶事字妙”；于卷二三评点奚贾《谒李尊师》“先玉容其微”一句，“容字、微字，人有下得妙者，合用不能”，都属此例。校勘诗文，不是《唐诗归》的着力点，它的重点在选评。因此，《唐诗归》评点不可能丢开蓝本辑校文字不顾，而去杂取《唐诗纪》之外的众多源资料。

其次，《唐诗纪》对某一具体诗篇的归属，直接影响着《唐诗归》。一首唐诗，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其归属可能会有异议。关于诗篇归属问题，具体可以从诗篇的作者归属、时代归属和体裁归属三个角度来展开。在作者归属方面，如《唐诗归》卷一选入马周《凌朝浮江旅思》一首，且锺氏评云“空静秀整，初唐至此另开一境”。而将此诗作者归属在明代以前就有争议。宋初《文苑英华》卷一六二将其归入韦承庆名下，南宋《唐诗纪事》于卷四马周、卷九韦承庆名下两存，明初《唐诗品汇》卷五七选此作韦承庆，《唐诗纪》则将其归入马周。除了此诗，马周几无他诗传世。换言之，后人只能通过这首完整的诗作来了解马周的大体诗风。因此，《唐诗纪》的这一断定，直接影响着锺、谭对马周及初唐诗风流变的批评。

在诗作时代归属方面，如《唐诗归》卷五徐安期《催妆》诗，锺评“此首，人决不以为初唐。”显然，其说前提正是视此为初唐之作。而始以“四唐”分期的《唐诗品汇》未选此诗，《唐诗纪》卷五九列此诗于初唐，并云“按其音调当作初唐”。锺、谭将该诗选入并有此评，是对《唐诗纪》自出手眼的肯定。关于《唐诗纪》诗篇时代归属对《唐诗归》的误导，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答王无功思故园见乡人问》一首。《唐诗纪》卷七辑录此诗，作朱仲晦诗，入初唐，列王绩后。《唐诗归》卷一据此选入，锺、谭二人各有点评。锺氏云“此人不凡，因思古人，虽居村僻，皆有此等素友。”谭氏曰“较无功问诗，更有情有力。”殊不知，此乃宋人朱熹诗。《唐诗归》的这一接受和点评，也直接成了钱谦益攻击它的口实。

在诗歌体裁归属方面，《唐诗归》虽然没有直接沿袭《唐诗纪》，明确标出“诗体类别”，但从锺、

谭二人的评语中，亦可随处看到《唐诗纪》的痕迹。像卷五张九龄《洪州西山祈雨是日辄应因赋诗言事》，锺惺评云“排律中带些古诗，非初盛唐高手不能。”谭元春评曰“排律至此入神入妙。”对于该诗，《唐诗品汇》和《唐诗纪》皆有收录，而前者归属五古，后者归属五言排律。再如卷一四李颀《寄镜湖朱处士》，锺惺评曰“律诗带古，惟盛唐诸人能之，如小楷兼隶法也。”李颀此诗，《唐诗品汇》未选，《唐音》和《唐诗纪》均有采录，《唐音》作五古，《唐诗纪》归五律。锺、谭二氏之所以有如此评论，正是以《唐诗纪》的诗体辨别为依据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亦可见《唐诗归》受《唐诗纪》影响之大。

当然，作为一部特色鲜明的唐诗选本，其在接受蓝本影响的时候，不可能是完全被动的，同时也应有自身积极能动的表现。上文所举诸端，如果涉及诗文内容为被动承袭的情况，那么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诗学观念无疑是锺、谭二人批评个性的彰显。也正因此，学者对《唐诗归》有着“猎奇”“求僻”的评论。《唐诗归》相比《唐诗纪》，其新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变“妍媸并收”为“严加铨择”，以彰显自身诗学观念。同样是“师唐”，但较之《唐诗归》初盛唐卷，《唐诗纪》重于“纪”，求“全”；《唐诗归》重于“选”，强调“灵”“厚”“奇”。这样的转变，是明代诗学观念演化引起的。李维桢在万历十三年九月所撰《唐诗纪序》中说“今之诗，不患不学唐，而患学之太过。”“山林宴游则兴寄清远，朝飨侍从则制存庄丽，边塞征戍则凄婉悲壮，睽离患难则沉痛感慨，缘机触变，各适其宜。唐人之妙以此。今惧其格之卑也，而偏求之于凄婉悲壮、沉痛感慨，过也。”（《唐诗归》卷首）其所言之“太过”，即指作诗一味地模仿唐人，而且只盯着少数作家作品。为纠正时人学唐之偏，《唐诗纪》放眼唐诗，提出“博观”“通识”“穷本知变”的师古诗学主张，将学习对象的范围大大扩展。具体落实到辑录作品方面，不分作家大小，不论作品水平高低，甚至是残篇只句，凡属于初盛唐部分，全揽尽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至明万历后期公安派出现，反“复古”之道而行，主张“师心”，诗学从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针对明代后期的诗学发展状况，《唐诗归》编者本着“所谓选者之功，能使作者与读者之精神为之一易”（卷一五）的精神，瞄准当时影响最为深广的旧题李攀龙《唐诗选》，以《唐诗纪》为基础，融合“师古”与“师心”，披沙拣金，择取“真诗”。

锺惺《唐诗归序》云“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唐诗归》卷首）所谓“精神所为”，指缘机适宜，情与景合，翰之以风骨，文之以丹青，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锺惺曰“余性不以名取人，其看古人亦然。每于古今诗文，喜拈其不著名而最少者，常有一种别趣奇理，不堕作家气。”（《唐诗归》卷一六）他又说，诸家诗数句之妙，全篇不称，不能收之（参见《唐诗归》卷一七）。在锺、谭看来，“真诗”非因人而定，不能有句无篇。由此出发，《唐诗归》初盛唐卷择录《唐诗纪》中“厚”“奇”“深心幽致”之诗作，去其繁杂校勘文字，稍增书外篇什，汇集成卷。也正因为有如此的铨选标准，《唐诗归》在采摭《唐诗纪》之外的诗歌作品时，不作过多考辨。如在选入孙思邈《四言诗》后云“此公得道，人隐见于世，在周，在隋，在唐，吾不能知，知其诗词奇奥而已，姑附于此。”（《唐诗归》卷六）不追究孙氏生世，单以其诗“奇奥”而揽入。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唐诗归》增益选录诗作甚至会出现个别疏误。如盛唐卷二三末端收录李琪《楞伽山亭留题诗板》一首，锺氏云“透悟深感之言。”《唐诗纪》未录该诗。李琪，字台秀，敦煌人。昭宗时，举进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入梁，为翰林学士。《新五代史》卷五四有传。《唐诗归》选录李琪诗，并将其归入盛唐，显系疏误。而这些不能不说是因追求其选诗的标准和倾向而造成的。

其二，去“体”为一，即对选入的诗歌只是以人系之，不再细分诸体。之前的《唐诗纪》“诗以人系”，同一人的诗作再以古今律绝加以区别。这是由编者的诗学主张决定的。《唐诗纪》代表的是明代复古派末流，强调“格律”“辩体”。锺、谭创设竟陵一派，选诗重视“性灵”，突出“个体精神”。因此，《唐诗归》自然选择“诗不分体，仅以人系”的体例。相对于《唐诗纪》，《唐诗归》初盛唐卷之所以在编例上有所改变，也是出于锺、谭对诗歌发展的认识。锺、谭认为，古今体诗歌是一脉相承

的，在古律交融发展的时期，古中有律，律中有古，一诗归属，不宜体分。如《唐诗归》卷二选有陈子昂《送客》一首“故人洞庭去，杨柳春风生。相送河洲晚，苍茫别思盈。白蘋已堪把，绿芷复含荣。江南多桂树，归客赠生平。”锺惺于其后评曰“陈正字律中有古，却深重。李太白以古为律，却轻浅。身分气运，所关不可不知。”对于初唐陈子昂的这首《送客》五言诗来说，从古律纯完的角度审视，可古可律。若严求声律，“相送河洲晚，苍茫别思盈”不整，其则入古。若苛求古调，“故人洞庭去，杨柳春风生”“白蘋已堪把，绿芷复含荣”不纯，则可入律。标准不一，类有区分。正因此，《唐诗品汇》卷三选入五言古，《唐诗纪》卷二二则入五言律。

锺、谭评点唐诗，虽然也从古、律的特点去观察，但在他们看来，不能人为地把一首诗界定为古诗或律诗。因为在唐代特别是初盛唐，正是古律交融发展的时期，如果对一首诗有了古、律的预先定性，则势必会影响学者对它的评价。锺、谭的这些观念，在《唐诗归》中曾不止一次地流露出来。卷一崔融《从军行》，锺氏云“作一首七言排律看，则妙；若看作歌行，反减价矣。”卷二刘希夷《江南曲》，锺氏云“作排律看，则流畅；作五言古看，则肤且近矣。”卷二四陶岷《西塞山下回舟作》，锺氏云“此等诗妙在七言律。今人作七言律看，便不敢取之。”卷二四张志和《渔父》，锺氏云“亦作七言律看方妙。”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唐诗归》初盛唐卷虽仍沿袭《唐诗纪》的诗歌排序，但卷内直接删除了其诗体分目，变“诗以人系，再以体分”为“诗以人系，不再分体”。锺、谭这样做，也是在有意弱化复古派所过分强调的“格律”“声响”，突出个体“性灵”，树立竟陵派诗学观念。

## 五 从蓝本的选择看《唐诗归》的成书问题

关于《唐诗归》的成书过程，邬国平先生和陈国球先生都有专文考察。如前文所述，两位最大的分歧是：初盛唐卷与中晚唐卷是否一起完成的？邬文认为，至万历四十二年十二月，《诗归》（不包括中晚唐诗）已基本成书，其中晚唐卷是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间，锺惺居南京时单独补选的<sup>①</sup>。陈文认为，在万历四十三年锺惺离家回京前，整个《诗归》（包括《古诗归》和《唐诗归》）已初步完成<sup>②</sup>。

今从《唐诗归》初盛唐卷以《唐诗纪》为蓝本来看，邬国平先生所考更为合理。理由有二：

第一，吴琯《唐诗纪》是继冯惟讷《古诗纪》而编纂的，二者亦曾合刊。汪道昆《诗纪序》曰：“北海冯汝言既辑历代诗纪，版之关中。坐蹕远而购之难，且病校者疏而梓者拙也。吴琯自新都起，拓什二以张东秦，身帅吴俞策、歛谢陞、江都陆弼分校之，召吴工敦劖劖。既告成事，莫不精良，则王元美序之矣。顾贞观而下未及也，誓将求全。嘱黄河水，首事而溘亡，仅得十有四卷。琯手自为集，嘱二三子校刻如初。”<sup>③</sup>冯惟讷《古诗纪》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初刻于陕西，万历十四年（1586）在吴琯的主持下又校刻于南京，与《唐诗纪》合璧，名曰《诗纪》。吴琯等校刻《古诗纪》时，对嘉靖本作了稍许删补。经比对可知，《古诗归》正是在吴琯刻本《古诗纪》的基础上编选的，即《诗归》（不包括中晚唐卷）是以《诗纪》（包括《古诗纪》与《唐诗纪》）为蓝本的。由于种种原因，《唐诗纪》只编成了初盛唐部分，而包括中晚唐诗在内的全集，至《诗归》编纂前，尚未面世。

第二，《唐诗归》在初步选定后，锺惺曾数次征询友人蔡敬夫的意见。锺惺《与蔡敬夫》云“两三月中，乘谭郎共处，与精定《诗归》一事，计三易稿，最后则惺手钞之。手钞一卷，募人抄副本一卷，副本以候公使至而归之公。”（《隐秀轩集》，第469页）《再报蔡敬夫》曰“冬春间一月之中，千里之外，得书及诗者三，亲遣使者二。”（《隐秀轩集》，第470页）蔡氏复书谕示锺惺，从其意见所

<sup>①</sup> 参见邬国平《竟陵派与明代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sup>②</sup> 参见陈国球《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3—276页。

<sup>③</sup> 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卷二四，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1册，第517页。

论范围来看, 锤、谭初步选定的《唐诗归》不含中晚唐诗。蔡敬夫回复锤惺“去取有可商处”, “若《诗归》中所取者, 不必论至, 直黜杨炯一字不录。而《滕王阁》、《长安古意》、《帝京篇》、《代悲白头翁》、初盛应制七言律、大明宫唱和、李之《清平调》、杜之《秋兴八首》等作, 多置孙山外”, “古诗中去取亦然”(《隐秀轩集》, 第471页)。这里无论是“初盛”“古诗”之总体称谓, 还是杨、王、李、杜等的个案表述, 足以说明: 此时商定的《诗归》, 只包含“古诗”和“初盛唐诗”。而这一取诗范围未出《诗纪》所涉。结合《唐诗归》初盛唐卷蓝本的选择情况, 我们有理由相信: 邬国平先生关于《诗归》成书细节的考辨更加合理, 即初步选定的《诗归》不含中晚唐诗卷。

诚然, 最初编成的书稿仅限于“基本”阶段。因为编者在此后对《唐诗归》又有增益。而且这种补选, 不限于中晚唐部分, 在初盛部分也有体现。较之《唐诗纪》, 《唐诗归》初盛唐卷有极少数作品增补, 如梁锜《长门怨》、李琪《楞伽山亭留题诗板》等, 这些诗多置于书中某卷卷末。从这些诗作在卷中所列位置及其中一些诗作的出处来看, 《唐诗归》初盛唐卷在基本完成后的确有过补录。比如, 《唐诗归》卷二三选录有严武《题龙日寺西龕石壁》诗, 《唐诗纪》失收, 锤惺“从曹能始《蜀中名胜记》得之, 深以为快”。《蜀中名胜记》三十卷, 为曹学佺所作, 本无此书, 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福清林茂之摘其《蜀中广记》之“名胜门”而成。《蜀中名胜记》初刻于南京, 锤惺曾为之作序<sup>①</sup>。从该书编成时间来看, 锤氏从《蜀中名胜记》一书中辑得严武《题龙日寺西龕石壁》诗, 不得早于万历四十六年。而其时《诗归》的编选已告一段落, 锤惺早已离家回京。严武《题龙日寺西龕石壁》等, 显然是锤氏后来从选录标准出发据他书辑补的。

此外, 《唐诗归》初盛唐卷以《唐诗纪》为编选蓝本, 呈现出明代唐诗学递变的脉络。《唐诗纪》承载的是复古派的诗学主张, 而《唐诗归》代表的是冲破复古牢笼的竟陵派。二者观念不同, 但在明代诗学发展的过程中, 他们之间找到了契合点, 博中约取, 螺旋演进。也正如锤惺对元结与孟云卿之关系的评价, “次山直奥, 云卿深婉, 各不相同”, 但二人“以词学相友二十年”(《唐诗归》卷二三)。明代复古派与竟陵派, 看似矛盾, 实乃一脉。

## 结 论

《唐诗归》作为明末一种重要的唐诗选本, 在唐诗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唐诗归》是在明代诗坛学唐之弊日趋加剧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编选蓝本不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唐诗品汇》(包括《唐诗拾遗》)。在编选时间短暂、“求异”“避熟”等主客观因素作用下, 《唐诗归》选择了万历前期黄德水、吴琯编纂的《(初盛)唐诗纪》为其初盛唐卷的蓝本。《(初盛)唐诗纪》在七子复古派倡导的“诗必盛唐”观念的掩饰下, 不露声色地将学者的目光引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锤、谭二人依托《(初盛)唐诗纪》, 融通“师古”与“师心”, 又在大量接受和稍许新变之间, 发挥自身能动性, 铨择评点对象, 传达重视“性灵”的诗学观念, 悄悄地立起了竟陵派的大旗。《唐诗归》成书之前, 在吴琯的主持下, 《(初盛)唐诗纪》曾与冯惟讷《古诗纪》合并为《(历代)诗纪》。《(历代)诗纪》是《诗归》的蓝本。《诗归》蓝本的确认, 进一步佐证了学界已有的结论: 锤、谭二人初步选定的《唐诗归》不包括中晚唐诗, 中晚唐卷是锤惺后来补充选定的。

[作者简介] 韩震军,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发表过论文《嘉靖本〈唐诗纪〉考辨》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sup>①</sup> 参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 上册, 第1023页。